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彭南生◎著

传承与变动： 近代转型时期的 城乡经济与社会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彭南生◎著

传承与变动： 近代转型时期的 城乡经济与社会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变动:近代转型时期的城乡经济与社会/彭南生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ISBN 978-7-216-05816-2

I. 传…

II. 彭…

III. 城乡建设—中国—近代—文集

IV. F29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069 号

传承与变动:近代转型时期的城乡经济与社会

彭南生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12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字数:365 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5816-2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代前言)

人们回首往事,大多是为了怀旧,怀念儿时的童趣,追忆少年时的野趣,感怀年轻时的奋斗,最后总会感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发出光阴催人老、日月遽少年之类的警世佳言。不过,于我而言,四十有五,正当壮年,不仅尚未到怀旧的年龄,而且也似乎无暇回首,手头的事情正多,家庭的、单位的、学业上的……,虽然有时也哼哼时下流行的“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但如同一阵风,哼过便罢,并未真正回过头去,认真地品味人生。但是,学术之路则另当别论,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它是生命的另一种呈现,甚至有超越生物体生命的历史意义。因此,如果有机会将过去发表过的论文结集出版,不仅能将一个学者的理性思考集中贡献于社会,亦能浓缩个人的学术之路。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学术文库·文集系列”的出版规划,使我能有机会重温曾经发表过的60余篇论文,并从中选取20篇,名之以《传承与变动:近代转型时期的城乡经济与社会》,奉献给学界同仁。

传承与变动,是近代中国历史运行的两种方式。传承乃传统的延续;变动,一方面是指传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指外来现代性因素的输入、注入或嵌入。传承与变动,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的转型,但是,两者孰重孰轻?孰多孰少?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中国的转型并未完成,政治上,民主化困难重重;经济上,工业化任重道远;文化观念上,被人们称为“封建残

余”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这究竟是传承之“过”呢,还是变动难竟其“功”?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传承本身,本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传承的对象,以社会风俗为例,良俗传承下来,便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恶俗传承下来,则阻碍社会的进步。变动也是一样,中国近代固然是一个“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但变的时机、变的方式、变的内容、变的速率,决定着变动的成效,否则,即便是如同戊戌变法那样巨大的变动,也不得不以失败而告憾于历史。相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上的剧烈变动而言,经济与社会的变动较为和缓,农业生产中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因素,工业化道路虽以“突发式”的移植型方式为主,但并未实现对传统工业的全面取代,绝大多数传统手工业不仅存在下来,而且在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上出现了积极变化,与此相应,经济性的社会组织,即商人团体或在延续中开始转化,或在转型背景下重新集结,总之,传承与变动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本文集围绕着近代乡村与城市经济社会领域里的传承与变动,选取 20 篇论文,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对近代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传统工业、近代商人团体及其活动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以具体细微的历史诠释了传承与变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展开的,将近代城乡经济社会领域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论文的原生态风貌,笔者对入选论文不作任何修改,哪怕是显而易见的论点之肤浅、行文之粗糙,单篇论文结集时难以避免的个别史料的重复,仍依其旧,以此如实地反映作者在学术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上篇冠之以“中国近代农民经济与农村社会”,包括八篇论文。《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采取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农家生产中的经营模式进行了归类分析,认为“耕织结合”的传统模式主要呈现出四种变化:(1)以农业为主,以市场导向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为辅;(2)以市场导向的手工业生产为主,以农业为辅;(3)纯农业经营户;(4)纯手工业经营户。从总体上看,前两种模式变动占据主导地位,纯粹的农业经营户和纯粹的手工业

经营户在近代农村并不具有规模意义。因此,“农工结合”始终是近代农家最主要的经营模式,但结合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它既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关键取决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性质。“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是作为弱势阶层的农民在应对市场的剧烈变化时,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经营。在“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中,以市场导向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维生型与唯利型。从农村工业化的角度看,唯利型的“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但是,近代中国的农情决定了维生型的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近代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乡村手工业是近代农民在农业之外的主要生产活动,近代中国农村中存在着三种形态的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匠手工业,其中家庭手工业占主导地位,工场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匠手工业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三种形态互为补充,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农民生产活动的复杂性。《论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三种形态》从宏观上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

农民家庭手工业何以能在乡村手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呢?《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一文认为,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形式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能够存在下来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的重要机制,对包买主来说,包买主制不仅节约了场房、工具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手工业者的分散性也为他们控制生产者并避免政府的苛捐杂税提供了便利,对依附经营者来说,包买主制解决了他们在生产资金上的不足,顺应了他们的小私有观念和部分传统习俗,避免了工厂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能够自由地支配劳动时间,在农业劳动之余附带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因此,包买主制适应了包买主和依附经营者双方的经济状况,客观上是一种具有“双赢”效果的经营机制。该文对包买主资本渗入乡村手工业的过程、依附经营者的依附方式及其依附“度”、包买主的存在形态及其

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当然,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具有曲折性、反复性,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其中,欺诈行为是近代乡村手工业中广泛存在的丑恶现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欺诈行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衰变》一文在全面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欺诈行为产生的根源及其所造成的危害,文章认为寻求短期利益动机的驱使、残酷的市场竞争与商人的过度剥削、有效管理的缺失是欺诈行为产生的显性原因,社会转型时期诚信意识的弱化与少数商人道德的败坏是其文化上的隐性根源。从根本上说,它是社会转型时期诚信意识的弱化与理性精神的缺失在经济生活中的反应,它的泛滥既表明了手工业在面对机器工业竞争时的无能为力,也反映了手工业者在面临商人残酷剥削时的消极被动,尽管政府与社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打击欺诈行为,但是对于如何扶持弱势产业升级,如何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并未采取真正有效的对策,由此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助长了欺诈之风的盛行。然而,无论是小生产经营者的主动选择,还是被迫之举,欺诈行为都对乡村手工业造成了极大危害,使乡村手工业活动陷入了衰变的怪圈中,欺诈行为是造成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变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不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造成更为沉重打击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若干行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生产工具的改良与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农村手工业产品产量与质量进一步提高,区域外市场迅速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致使沦陷区市场丧失,生产基础遭到摧毁性破坏,乡村手工业从技术进步的、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半工业化生产向一般商品生产、甚至向自然经济退化,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良好发展势头被迫中断了。《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中断——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一丝织业为讨论中心》一文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一丝织业为例,分析了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中的外力因素及其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讨论了农家生

活中的精神层面,文章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呈现出多维存在、多元化表达的特点,在存在形式上,日常性、节令性与应事性三种形式互补,在表现形式上,宗教文化、地方性戏剧、乡土性娱乐、迷信文化等多元共存,出现了宗教文化日常化、戏剧文化节令化、迷信文化应事化趋势。

农民离村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农民离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学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针对既有分歧进行商榷,认为中国近代农民离村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特殊流动,从人均耕地数、人均粮食及其土地需求量等方面来看,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静态人口压力,自然灾害、军阀混战、耕地抛荒与改种等动态因素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人口压力,在静态与动态的双重人口压力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加突出,离村成了无法选择的选择。离村的农民向何处去?研究表明,呈现出到“宽乡”垦荒、到国外当华工或进城谋生活等多元流向,其中进城成为离村农民的主要去处。离村农民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集中反映在《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论析》一文中。就正面影响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不过,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并非像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那样,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拉”力与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反,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并不充分、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其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效应,造成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城市人口职业结构严重失衡、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城市治安恶化等问题,使近代城市化进程在“亚病态”下曲折前行,因此,农民离村与离业处于脱节状态,如果说英、美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近代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

中篇探讨了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传统工业。将传统工业放在工业化视角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

多面相关系,也更能把握传统工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近代文献中,传统工业有时被称为“手工工厂”,有时被称作“手工工场”,笔者在引用时仍保持原貌。《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一文考察了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主要是手工工具的改良和“石磨+蒸汽机”模式的出现,这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技术产生了若干积极效应,不仅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也为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过去学术界对直接引进外国机器建立现代工业的移植型道路研究较多,对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转化注意不够,这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移植型的工业化之路虽是近代中国无法选择的选择,它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也确实起主导作用,但是移植进来的工业文明(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对传统工业主要采取一种摧毁式的取代,而其自身能量又无法完全吸纳失业的传统工业工人,从而遭到手工业者的抵抗,同时民族机器工业又由于遭受外资在华企业的特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利用传统工业的劳动成本优势,使得移植型的工业文明的扩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工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还会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存在,移植的工业文明难以一下子全面代替工业生产中的手工方式,而只要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没变,中国就不可能到达工业化的彼岸。因此,近代中国在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之外,还必须对传统工业进行嫁接改造,走嫁接型的工业化之路,即近代中国工业化应是一条二元工业化道路的结合。《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一文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对近代中国二元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实证分析。民族棉纺织业是一个跨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型,机器棉纺业与手工棉织业在移植与嫁接中共同进步,虽有竞争,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嫁接型的工业化方式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互补并不是近代棉纺织业中独有的现象,从宏观上看,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补关系。其一,因行业结构性差异而形成的互补关系;其二,生产上具有关联性的行业在产品销售市场上的互补关系,一部分行业的产品构成另一行业的生产原料,一部分行业的产品则构成另一行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彼此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其三,生产同一产品的跨层次行业在市场的空间分布及产品的需求层次上的互补关系;其四,近代民族工业中手工劳动、手工技术对机器工业的补充。上述四种互补关系可以简约化为行业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近代中国若干农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不仅没有在国外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双重竞争下消失殆尽,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颇具内涵性的扩展,产生了若干乡村手工业经济区,其中较为典型的行业有织布、缫丝等传统行业,也有针织、花边等新兴行业,较为典型的地区有河北的高阳、宝坻、定县,山东的潍县,苏北的南通、海门,苏南的无锡、常州,浙江的平湖、吴兴,广东的南海、顺德等。不过,它们也未能完成向工业化的进一步转化。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笔者主张将其定性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一文对半工业化现象的产生原因、存在形式、地位与作用、发展前途、主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半工业化是指在工业化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它的兴起不仅是近代中国农村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产物,而且主要是机器工业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产物,地方能人在半工业化兴起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区域外市场是半工业化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多元共存的生产形式使半工业化在市场波动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技术进步、区域外市场与多元共存的生产形式构成半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半工业化的衰退主要是外力作用,尤其是1929~1933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如此,半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还是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适合于对近代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下篇围绕着近代城镇商人团体及其活动展开论述。中国自古就存在着行业性的商人组织,宋代出现过行、团行,明清时期,在行、帮之外,还出现了会馆、公所等名称。近代以来,这些传统商人组织在传承中有变动,在变动中有传承。从制度变迁上看,同业公会实属旧式行会的“近亲”,会馆(主要指行业性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具有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缘分,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马路商界联合会并非舶来品,作为一种街区性的商人团体,颇类似于隋唐时代的行,那时绝大多数的行是作为同业商店相对集中的街区组织,与入宋以来带有垄断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业组织不同,当然,马路商界联合会已经注入了许多现代性因素,与隋唐时代的行不可同日而语,近代同业公会、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活动能量也是传统商人组织不可比拟的,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十分活跃的身影。本篇在制度变迁理论的视野下,探讨了近代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功能转化、现代性以及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性质,并撷取几个重要历史片断反映近代商人组织的活动。

其中,《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一文选取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的421份碑刻为分析样本,对碑刻的产生、传承及其功能变化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作为行业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刻石立碑是工商业会馆、公所从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行会受到封建官府保护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会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一文讨

论了同业性的商人团体的变迁,认为中国近代行会制度完全为同业公会制度所取代经历了90余年时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组织缓慢趋新,功能逐渐转变,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同时,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一文以大量史实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述。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

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五四运动后兴起的街区性的商人团体,本篇的几篇论文主要对上海地区的马路商界联合会进行了具体分析。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地区的“商联会”及“商总联会”是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以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经济地域性商人团体,它突破了既往同乡会、行会等旧式商人组织的乡缘、业缘限制,在五四运动、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五卅运动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动员作用,成为民初上海地区与总商会、商业公团联合会等组织鼎足而立的团体。《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简要论证了上述观点。

1923年是中日民间外交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份,相继发生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摆在中国面前。一方面,日本政府援引“二十一条”,拒绝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另一方面,日本东京、横滨等地在9月初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造成了重大伤亡。从前者来说,日本政府的霸道行径,自然激起了中国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上海等地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主的民间团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对于后者,中国民间对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表达了深切同情,理性地将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上海各团体纷纷提供物质援助与精神慰藉,发起了规模广泛的赈济日灾活动,演奏出一曲悦耳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响曲。上海民间团体赈济日灾的善举,高扬了中国自古以来悠久的“救灾恤邻”的人道传统,诠释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使中华民族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时,赈济日灾的活动的开展,也使得以经济民族主义为诉求的抵制日货运动更趋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织:1923年上海民间团体的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一文重构了包括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内的上海民间团体在两大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图景,并着力解读这些活动背后的理念。

五卅运动时期,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织和动员广大中、下层商人以同盟罢市、函电抗争、捐助款项等多种方式参与了五卅运动,

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一种有力声援,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对外交涉的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学生的后顾之忧,使得斗争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下来,成为上海各商人组织中政治性格最为鲜明的街区性团体。《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以报刊史料为主,分析了该组织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该文认为,五卅运动中的罢市是一种斗争手段,开市是一种策略选择,罢市与开市之争,不应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分界线,更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坚定与否的标志。

发生在1926年的“陈阿堂案”不仅震动了上海滩,而且波及全国,包括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内的各界团体与政治力量对陈案进行了抗争。1926年8月,上海小商贩陈阿堂被发现死于日轮“万里丸”上,史称“陈阿堂案”。日方依仗强权与特权,对案犯极力开脱与庇护,北京政府“依约”听任日本政府处置陈案,压制民间抗争,反映了其国际地位的低下及其与民间的紧张关系。商界或基于同乡之谊、或同胞之情,采取了符合自身性格的声讨与声援行动,为复原陈案真相、谋求法律惩凶作出了努力。工界站在抗争行动的前列,毅然发起了同盟罢工,将自身利益诉求与为同胞伸冤、取消日本治外法权结合起来,演出了一曲反抗日本压迫的生动活剧。处于北伐前夕的中国国民党在抗争中积极联合并引导工界和学界,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政治力量,其不同于北京政府的“废约”要求,不仅将自身与军阀势力鲜明地区别开来,而且树立了以推翻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展现了国民党积极争取国际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国各界的抗争虽然未能改变日本对陈案主犯重罪轻判的结局,也未能达到废约目标,但抗争行动显示了蕴含在民众中的深厚的反抗外国列强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的愿望,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公理、人权和人道的决心。《对商贩之死的抗争:以1926年“陈阿堂案”为讨论中心》一文反映了上述内容。

重温曾经发表过的60余篇学术论文,感慨良多,遗憾甚多,聊以自慰的是,每一篇论文都是笔者思考的结晶,都曾留下笔者跋涉的印痕。昔日为爬梳史料而北上南下、为遣词造句而冥思苦想的情景仍

时时浮现在脑际,盛夏时的挥汗如雨,没有电脑时代的手抄笔录,仿佛如昨日,历历在目。因此,其文虽丑,但敝帚自珍,每一篇文章都记录着笔者求真求实的足迹,字里行间浸透了散发着墨香的汗水,这种奋斗精神已经内化为生命的元素,也激励着笔者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

学术无尽头,“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吾将上下而求索!

目 录

上篇 中国近代农民经济与农村社会

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	(3)
论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三种形态·····	(29)
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	(50)
欺诈行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衰变·····	(71)
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中断 ——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讨论中心 ·····	(91)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 ·····	(115)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 ——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	(138)
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论析·····	(150)

中篇 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传统工业

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	(165)
--------------------------	---------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	(183)
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	(202)
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	(220)

下篇 近代城镇商人团体及其活动

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257)
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	(272)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294)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刍论	(314)
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	(330)
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织:1923 年上海民间团体的抵制 日货与赈济日灾	(346)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362)
对商贩之死的抗争:以 1926 年“陈阿堂案”为讨论中心	(382)